

关于斯大林问题的再认识

主编 卢之超

副主编

崔奇

吴仁彰

李树藩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关于斯大林问题的再认识

主 编 卢之超

副主编 崔 奇 吴仁彰 李树藩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京) 新登字028号

关于斯大林问题的再认识

主 编 卢之超

副主编 崔 奇 吴仁彰 李树藩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密云华都印刷厂印刷

850×1168 1/32开本 10.75印张 273千字

1994年6月第一版 1994年6月第一次印刷

ISBN7-80050-530-8/D·116 定价：9.8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 言

卢之超

(一) 斯大林问题，无论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还是对于研究20世纪的国际政治、20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和世界历史，都是一个重大的课题。在当今世界上，无论研究者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上，也无论他们抱有什么样的观点，从赞成马克思主义、拥护社会主义的人们，到否定马克思主义的人们，以及各种各样的马克思主义者或社会主义者，看法尽管千差万别，甚至绝对对立，从完全肯定斯大林到完全否定斯大林，但是有一点恐怕是比较一致的，就是认为这个问题十分重要，值得研究，正因为如此，有关斯大林的各种各样的著作层出不穷，汗牛充栋。仅翻译介绍至国内来的出版物就有上百种之多。

为什么这个问题如此重要而又如此引起人们的兴趣？因为斯大林问题绝不仅仅是对斯大林这个历史人物的个人评价的问题，绝不仅仅涉及某些历史学者的学术兴趣，而是涉及十分广泛的范围。比如说，它涉及对苏联历史和苏联解体的许多问题的认识；涉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对这个运动当今处于低潮的原因以及今后的发展趋势的理解；涉及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对它的经验教训、历史命运和今后发展趋势的认识；涉及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理解，包括对当前出现的西方各种马克思主义思潮、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认识以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理论与实践等等问题的认识。更广泛一点说，它还涉及对于近一个世纪(至少是苏联存在的七十多年)的国际政治的理解，包括十月革命以后苏联的存在发展及其与西方的关系，第二次世

界大战，中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革命胜利，西方一些国家革命的失败及资本主义在战后的相对稳定和发展，冷战时期的斗争，原东欧各国的剧变和苏联的解体，当前国际形势等等。对于我们来说尤为重要的，是涉及研究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进一步认识社会主义的本质以及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道路、方法，从而进一步明确社会主义改革的方向、道路，继续探索和完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等等。因此，中国的理论工作者，特别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学者，研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和苏联、东欧历史的学者，应当有勇气去认真地、深入地研究这个问题。

（二）斯大林问题，又是当前理论研究中非常困难、非常棘手的问题之一。首先是涉及的时间跨度很大。虽然斯大林的活动主要是在本世纪二十至五十年代初，也就是他领导苏共和苏联的三十年时间，但往前追溯到十月革命以前，往后直至苏联解体，都与这个问题有密切关系。其次是问题的范围广。斯大林在长达三十年的时间里是苏共和苏联国家的领导人。苏联是第一个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的国家，是第一个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它曾经一度是世界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又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反法西斯战争的主力，战后又是两极对峙和争霸的两个超级大国之一。因此斯大林问题不能不同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共产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20世纪的世界历史和国际政治等多方面问题有关，涉及的面十分广泛，——这在前面已经说到。当然，这不能不决定研究这一问题的难度。第三，从研究的资料来说，虽说有关的出版物已经不少，但真正研究起来仍感材料极为缺乏。由于过去苏联的保密制度、思想控制和宣传的需要，不仅真实的材料很少披露，而且许多事实被有意掩饰或歪曲，使得历史真实被浓厚的烟雾所覆盖。近年来档案逐步公开，许多事实真相被揭露，但仍有不少事实没有或无法弄清，而且在大量回忆录、揭露过去的文字以至暴露文学中，有许多事实

又从另一方向被歪曲。总之，事实材料不足，真伪难辨，更增加了研究问题的困难。最后，特别困难和棘手的是，这个问题的研究涉及各个国家、各个阶级、各种党派的实际利益和政治态度，因而在对一系列问题的看法和评价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从全盘肯定到全盘否定，从揭露谎言到制造新的谎言，各种材料和理论观点层出不穷。在这种情况下，要求寻求符合历史真实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分析和结论，更是困难而棘手的任务。——更不用说多数研究者所接受的分析和结论了。

1963年9月，在当时发表的《关于斯大林问题》即所谓“二评”（二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中，毛泽东曾加了一句话：“斯大林问题，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大问题，曾经引起了世界各国一切阶级的反响，至今还在议论纷纷。各个不同的阶级，代表各个不同阶级的政党或政治派别，意见不同。估计在本世纪内，这个问题还不可能作出定论。”附带说一句，当时包括评斯大林问题的“二评”在内的“九评”，由于历史的局限，特别是当时所持的“左”的观点，有不少片面的、错误的地方，现在看来有许多问题要重新研究、重新认识。例如斯大林问题，就需要根据新的历史条件所提供的材料和视角，进行再研究、再认识。但“二评”中这句话至今仍是真理。

（三）既然关于斯大林问题的研究是如此重要又如此困难，真正想着手研究，又犹如老虎吃天，不知从何下手，怎么办呢？置之不理当然痛快，但问题依然存在。拿起研究又无异自讨苦吃。但细想起来，研究什么问题又不是自讨苦吃呢！选取有限目标，从“足下”开始，逐步向前走总是可以的。在目前，最好是兵分两路，一是选取若干问题，由一些同志分头研究，分门别类，深入、具体地弄清事实，在这些具体问题上逐步取得一些初步的但是比较扎实的认识。二是综合考察重大的历史进程和历史事实，在已有材料和研究的基础上，通过相互讨论、相互切磋，逐步从宏观上取得一个初步的总体评价和主要的结论。这两方面的研

究，应该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我们既不可以脱离具体问题、事件、材料的研究而流于空泛的议论，也不能忽视宏观的研究和评价而在某一具体问题上钻牛角尖。

虽然问题是复杂的，要在这个问题上得出全面的、客观的、科学的结论，需要许多人的努力，经过漫长的道路，而且还要继续经受历史的正反经验的检验。但是唯物主义者是可知论者，从根本上说不承认不能认识的事物，作为历史现象的斯大林问题也是如此。或者说，对于这个问题，绝对的全部完成了的认识，现在不可能，将来也很难说（且看许多相距多年的历史人物和历史现象，至今仍争论不休），但相对的，在若干重要问题上得出尽可能符合事实的、科学的认识，应当说是可以争取做到的。从另一方面说，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科学分析问题的人们中间，在坚信科学社会主义事业的正确性和真理性的人们中间，尽可能求得一个符合事实的科学认识是可以达到的。要求通过研究使各个阶级、各种观点的人们都能达到认识一致，则相当长时间甚至很长时期都是不可能的。那是一种奢望，在遥远的未来能否实现也很难说。总之从马克思主义观点出发，从社会主义事业的利益出发，对于斯大林问题的研究，我们应当有勇气，有信心。

（四）斯大林问题作为一个理论研究、学术研究的题目，由于它的重要性，特别是由于它的复杂性和困难程度，决定了我们在研究这一问题时，必须采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通过百家争鸣逐步求得真理的态度，而且这是唯一可取的态度。首先，因为这个问题历史跨度大、涉及面广，而且政治性强，易于受某一时期的政治形势和要求的影响，产生认识上的局限性甚至实用主义的结论。因此，要注意用历史的眼光，把它放在世界历史发展的全局中去考察，而特别注意不受一时政治需要的局限。在这方面有不少教训。原苏联的苏共党史研究，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斯大林亲自主持编写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并把它作为共产主义

运动的经典教材，自以为一切都是最终真理性的结论。那是当时的政治需要。现在看来，虽然不乏正确的方面，但整个说来离真理、甚至离事实真相十分遥远。赫鲁晓夫上台，急忙改写苏共党史，但不是使斯大林由神变成人，而是把他变成魔鬼，变成一切罪恶的承担者。然而对历史的认识仍然没有多少前进，一切都没有得到真正的说明。后来勃列日涅夫等等，又是一个人上台、一个朝代修改写一遍党史，斯大林一会儿遭到严厉的谴责，一会儿又在某些方面受到肯定以至歌颂。甚至戈尔巴乔夫在几年之内就变了几次调子。当然随着时代的前进，许多材料揭露出来了，人们的认识也提高了。但就历史研究的态度来说则没有多少前进。斯大林以至整个苏共历史变成了这些人按照需要随意捏塑的泥团，以至人们看他们对斯大林的叙述和评价时，与其说是想从他们那里进一步了解斯大林问题，不如说想从他们有关斯大林问题的说法中了解他们的政治态度、政治需要。另一个例子，就是六十年代中苏争论。当时的一些文章虽然不无局部的真理，但整个说来也是不成功的，多数是从当时两党两国政治斗争的需要出发，以“左”的观点去评说问题，而很少严格地从历史事实出发，实事求是地寻求科学的结论。前面提到的关于斯大林问题的二评就是如此。这些方面的教训都值得引以为戒。

当然，社会历史问题的研究，不能不受政治气候的影响，并为一定政治需要服务。但是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科学地研究社会历史问题，得出符合历史真实与规律的结论，才能真正为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和需要服务。拿我们今天的现实来说，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是我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这个理论和路线的确立，首先是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结果，同时也是由于正确分析了国际形势的变化、汲取了十月革命以来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经验。因此，我们如果能在关于斯大林问题的研究上有所进展，能对社会主义建设和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

有进一步认识，必然会对我们的认识和工作有所借鉴，从而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改革开放的事业。但是我们不能反过来，不是从历史事实出发进行认真的研究，而是以我们现实的需要或已得出的某些结论去裁剪、解释斯大林的有关问题，勉强得出一些表面看来是为现实服务的结论。那样做经不起历史的检验，也没有什么真正的好处。

斯大林问题既然十分复杂，涉及面十分广泛，因而在许多方面众说纷纭，不易达到统一的认识就是很自然的事了。在研究和讨论中必然是见仁见智，百家争鸣，没有也不可能有统一的调子。斯大林已经逝世近40年，他所起作用的那一段时间已成为历史，有必要也有可能将这个问题作为历史人物和历史现象进行理论学术研究，通过深入的研究，通过不同意见的切磋、讨论和争论，逐步寻求比较正确的结论，达到比较统一的认识。从当前有关的讨论来看，由于长期个人崇拜期间形成的许多结论没有经过批判性分析，或者说由于历史形成的思维定势，过去一些不加怀疑就加以肯定和歌颂的观点仍有其影响，这种影响有的甚至是无形的、无意识的。同时，由于大量过去鲜为人知的事实被揭露和苏联解体，特别是由于西方和原苏联境内反共势力的歪曲宣传，全盘否定斯大林的历史作用以至苏联历史的观点，带有感情色彩的揭露性的言论，则有更大的影响。因此在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既要重视和参考各种意见，更要依靠可靠的历史事实，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进行独立的思考。就是说，要遵循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原则，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一定要以事实和根据，对问题独立地进行全面的、历史的分析，而不受有意识或无意识形成的框框的束缚。在这个问题上，也要像邓小平同志所说要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

（五）斯大林问题很复杂，可以从多方面进行研究。也只有多方面、分门别类地弄清各个历史阶段、各个专门方面的事实及其实质，最后才可以经过综合得出比较全面的结论。当然，也需要

从宏观方面就几个较大的问题研究出一些粗略的结论，并以此为引导更详细地进行研究。就宏观方面说，有的同志把问题分成三个大的方面，我以为是合理的。第一是斯大林的历史作用，或者说斯大林领导苏联的30年历史及其中一些主要的是非功过。例如在列宁逝世后最初几年围绕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斗争；结束新经济政策和实现农业集体化问题；以非常手段高速进行工业化的问题；同反对派的斗争与肃反扩大化或叫大清洗的问题，反法西斯战争与战前准备问题，等等。第二是斯大林时期形成的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体制，它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推动作用和消极作用，或者说它在一定历史时期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及其弊病。第三是斯大林的理论，包括哲学、政治学说和政治经济学，而以对社会主义理论的阐述为核心，它的正确方面与错误方面，它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关系，等等。当然就大的方面说也不止这三个方面，还有斯大林对国际形势、国际问题的分析和他所执行的国际政策，包括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方面的理论和政策，斯大林关于党的建设、党内斗争方面的理论和实践，斯大林关于军事方面的理论、战略以及在反法西斯战争上的成功与失误等等。但上述三个方面是主要的，比较可以概括地反映问题的重点，也可以把许多有关的具体问题带动起来。

（六）研究斯大林问题，同研究其他社会历史问题一样，应当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应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社会阶级分析的方法，具体地历史地分析问题，以求得出科学的结论。一句话，就是要有正确的理论指导和科学的方法。这个问题，说起来简单，做起来不容易，因为有许多矛盾现象，进行恰当的分析十分不易。例如，斯大林领导时期苏联取得的成功和遭到的失败，斯大林本人的功和过，现在的论述，除了一概肯定或全盘否定这两种过于极端片面的观点之外，就是分析，也往往说有哪些是做得对的，取得了成功（例如工业化），哪些是错的，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如大清洗）。但是细分析起来，功与过、对与错，往往纠缠在一

起，甚至是一个问题的两面。就是说，常常在成功里包含失败，正确里包含错误。在二次大战爆发前两个五年计划多一点的时间里，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在经济发展主要是工业化建设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个成功对于当时苏联社会主义的巩固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都十分重要，因而是正确的。但是这个成功包含了苏联人民的巨大的牺牲（有些是必要的或不可避免的，有些是不必要的或不可避免的），这个成功的取得也包含在实现过程中的许多错误做法，如在与反对派斗争中粗暴的做法以及肃反的扩大化，在农业集体化过程中粗暴地对待农民，以至造成农业的衰败，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以及与之相联系的专横、独裁，等等。但是如果这些错误和弊病都避免了，成功也就没有了，至少是很难取得；而这些错误和弊病的存在和发展，则孕育了后来更大的失败。附带说一句：这样的情况不仅在斯大林和苏联的问题上遇到，中外历史上有不少类似的现象。从这里引伸出一个更重要的方法问题，就是我们必须把历史事件和人物、把斯大林的有关问题拿到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下加以分析。而绝不能从抽象的原则出发去衡量或评价。从抽象的人道、自由、民主等等基本上属于唯心史观的那些原则出发不行，即使从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则出发也不行。如果那样做，得出的结论恐怕会比斯大林的错误更加错误。我们只能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结合当时苏联面临的那些国际国内条件和任务，从实际出发加以分析和评价。许多具体的历史情况这里不说，我想首先说一个时代问题。斯大林活动的主要时期，从本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是我们现在这个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还是战争与革命的时代？显然是后者而不是前者。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十月革命和欧洲许多国家的革命，从资本主义世界对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武装进攻、包围封锁到希特勒的大举入侵，从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到民族解放运动的风起云涌和欧亚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这显然是一个连续几十年的战争与革命的时代。资本主义

世界虽然在20年代有短暂的平稳发展，但大部分时间处于经济社会危机和革命危机之中，十分害怕无产阶级起来革命、害怕社会主义影响的扩大；社会主义苏联在建设中虽有严重困难和失误，但一直处于发展和胜利之中，对于资本主义世界的无产阶级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广大人民产生日益增大的吸引力。因而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苏联建设的速度和成败，不仅是社会主义生死攸关的问题，而且也是资本主义制度生死攸关的问题，尽管二者方向是相反的。因此，对于斯大林当时的各种措施和事件的是非得失，要放在当时的时代中去衡量和评价，而不能以当今已经变换了的时代条件去衡量评价。

作为上述方法的展开，下面试举一些例子。

（七）有一种看法，并不否认斯大林时期经济发展特别是工业化的巨大成就和卫国战争伟大胜利的意义，但认为那是苏联人民牺牲奋斗的结果，没有斯大林的功劳可言。斯大林只有许多错误和罪行，如强制进行农业集体化、大清洗、对战争准备不足等等。这种看法尽管在国外很流行，但是很难令人苟同，因为太绝对化了。还有一种看法，部分地肯定斯大林在领导实现工业化和卫国战争中的积极作用，但认为斯大林的其他措施，如突然地强制推行全盘集体化是完全错误的，其后果也完全是消极的。这种看法也值得商榷，因为把历史上相互联系的事物割裂开来了。苏联的高速工业化，是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所要求，在帝国主义包围，以至战争日益临近的形势下，能否以非常手段高速实现工业化，建立起重工业和军事工业的基础，是苏维埃国家生死存亡的问题。没有工业化的实现，也就不可能取得卫国战争的胜利。而工业化与农业集体化又是联系在一起的。因为当时细小分散、商品率十分低下的农业已经完全不能满足城市工业化的需要。而如果采取类似新经济政策的做法，通过轻工业品与农产品的交换以积累资金和增加农产品的商品率，将是十分缓慢的过程。可以说，如果不较快地实现集体化，也就没有高

速度的工业化。可见集体化是形势的需要。而从原则上说，通过合作化道路实现农业集体化，大的方向也是正确的。问题在于，斯大林采取了十分粗暴的做法和十分机械的形式，而且后来又沒有及时加以调整，因而不僅给农民造成重大的牺牲，而且对农业的发展造成了长远的严重后果。至于肃反扩大化或大清洗，当然是错误的、应当否定的。但也不可能完全归因于斯大林的个人品质，除了当时尖锐复杂的内外斗争环境的原因外，还有俄国的缺乏民主传统、苏共党内民主和苏维埃国家法制不健全以及当时党内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的普遍情绪等等。就是说，也要放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才能理解。总之，一切只有放在当时的国际形势和苏联国内紧迫的建设任务等历史条件下进行辩证法的分析，才可以理解在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早期建设的历史上，为什么尽管有那么大的错误和牺牲，人民仍然保持那么大的革命和劳动热情，取得那么大的成就；为什么社会主义在世界上有那么大的吸引力；人民和苏共会容忍斯大林的错误甚至仍然拥护他；等等。单纯用什么“欺骗”、“不了解真相”等浅层原因是解释不了历史的。

（八）体制问题也一样要放在具体历史条件下进行分析。斯大林时期形成的政治经济体制是有很弊病的，现在看来更是不可取的、需要改革的体制，然而它同当时条件下的认识和实践（包括错误的认识和实践）分不开。前面所说的当时形势以及高速实现工业化、准备日益临近的战争等任务，是形成那种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的主要原因。当然那种体制的形成同没有任何经验可供借鉴，对马克思主义机械教条的运用也有关系，并且还受当时激烈的党内斗争的影响。但是不管怎么说，那种体制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是适用的，也不能说没有调动劳动群众的积极性。实践证明它对生产力的发展起了巨大的积极的作用。如果我们把这种情况同当时资本主义制度面临的危机相对照，就可以看得更明显。这种情况同历史上常见的情况一样，说明当一种进步的、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制度代替腐朽不堪的旧制度时，尽管有种种弊病和不完善，尽

管给许多人带来巨大困难和牺牲，广大群众不仅能够忍受，而且仍然欢迎和拥护^①。我们必须以历史的眼光，而不能以今天已经变化了的条件去衡量和评价它。

在体制问题上还有一个过于笼统的看法，就是把斯大林时期的错误和后来的不良后果完全归结为体制的弊病。其实这是很不全面的。应该说，除了体制之外，还有一个发展战略问题。例如由于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不恰当估计造成的过快过急的要求，单纯追求产值的粗放式经营，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比例失调，过分强调重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而忽视和牺牲了农业、轻工业和人民生活改善，等等，这些与体制有关，但不都是体制问题。就是说，并不是体制决定了要实行这种发展战略，至多是在那种体制下才能实行这种发展战略。把发展战略方面的失误完全归结为体制的原因是没有根据的。而从某种意义上说，发展战略上的失误对于苏联后来造成的经济发展上的严重后果是更为直接的原因。

（九）无论是斯大林时期形成的经济政治体制和实行的经济发展战略，尽管有弊病和错误，但有其历史的原因、历史的必要性和积极的历史作用，我们不能以现在的条件和观点去苛求。问题在于随着历史的发展，这种原因、必要性和作用已经逐步消失，但体制没有及时进行改革，发展战略没有及时进行调整。恩格斯说过，社会发展中的每一阶段“对它所由发生的时代和条件说来，都有它存在的理由；但是对它自己内部逐渐发展起来的新的、更高的条件来说，它就变成过时的和没有存在的理由了”。不仅新旧社会制度的更替是如此，在基本的社会制度不变的情况下，对其内部较小的阶段来说也是如此。资本主义制度从产生以来至今几百年间，其内部的关系、具体制度经过多次的调节和变动，至今

① 恩格斯曾经说过：“当一定的生产方式处在自身发展的上升阶段之时，甚至在和这种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分配方式里受到损失的那些人，也会赞成这种生产方式”（《反杜林论》，第152—153页）

仍在不断调节和变动。社会主义作为一个要极大提高社会生产力和人民生活水平、最终消灭阶级剥削和阶级对抗的崭新的社会制度，而且又是在发展比较落后的少数国家里首先建立，在其漫长的建设过程中怎么能不经过多次的改革和调整呢？怎么能把特殊条件下建立的体制和发展战略作为固定的永恒的模式呢？前面我们分析斯大林时期建立的体制和实行的发展战略，至少是对于苏联卫国战争胜利或战后恢复为止的时期内有其存在的理由（尽管有不少错误和弊病），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早就失去其存在的根据，应当进行改革和调整了。事实上，苏联在其发展中有多次实行改革的时机，如工业化基本实现的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斯大林逝世，赫鲁晓夫逝世，等等。虽然赫鲁晓夫等人也试图进行改革，但除了改革战略和措施的失误外，主要是在体制和战略的基本思路上都没有根本的变化，因而都不成功。至于戈尔巴乔夫，则把改革变成放弃社会主义了。

（十）在苏联存在的七十二年的历史中，斯大林时期为三十年左右，斯大林以后为三十八年。我们主要是讨论斯大林问题，也不妨讨论一下斯大林同他以后这个时期的关系。一方面，不能把以后这三十八年中没有改革或改革不成功，直至导致社会主义在苏联的失败，都归罪于斯大林。斯大林逝世时虽然遗留了大量严重的问题，但是毕竟为社会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建立了强大的物质基础和聚积了巨大的实力，毕竟有几十年改正错误和改革体制的机会，他不能对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几个时期的事情负责。另一方面，也不能认为斯大林与此无关。斯大林遗留下来的问题，除大清洗造成的社会的、道义的、心理的严重后果，经济结构失衡、农业落后，对外政策的失误等等以外，最重要的，恐怕是社会主义经济政治体制的凝固化和思想理论的僵化、教条化。首先是思想僵化。斯大林多半是一个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理论里有相当浓厚的形而上学。他在一个落后的国度里、非常的形势下建设社会主义，尽管许多做法是当时特殊现实情况所要求

的，尽管许多做法实践证明是有弊病或不成功的，但他却把这个建设过程中建立起来的体制和采取的战略都视为神圣不可改变的普遍适用的公式，是用不着随着条件变化而改革的固定模式，并且从理论上加以论证和确立，形成如《联共（布）党史》、《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这样的“经典”。虽然有些问题他也能作某些改变和发展（如部分地修改“完全适合”的观点，部分地承认商品生产等），但是只有他有权“发展”，别人只能按图索骥。斯大林著作中大量引证马克思和列宁，一是为了同反对派论战，一是为当时的实践辩护，因而多是机械的或实用主义的理解，十分缺少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那种从实际出发的历史感和辩证法的灵活性。由于缺乏党内民主和思想宣传方面的教条主义控制，他的这种形而上学教条主义理论教育和影响了几代人，一方面在党内和人民中造成思想僵化，扼杀了生气勃勃的创造性，一方面为地下暗中流传的反社会主义思想造成了肥沃的土壤。这不能不为后来未能进行改革和改革没有正确方向埋下了思想理论方面的祸根。其次是经济政治体制的僵化。这里不谈经济政治体制的具体方面，而主要谈谈它在阻碍甚至扼杀苏共和苏联人民的主动性和社会经济政治结构的自我调节能力问题。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虽然当时有其历史的必要，也一度焕发过劳动者的热情，但由于这种体制当时就包含着弊病，特别是长期被凝固化，再加上斯大林过分强调阶级斗争，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以及专横武断，破坏民主法制等，从而逐渐窒息了苏共党内和苏联社会的活力。经济上统一的无所不包的公有制和否定商品经济、排斥竞争，思想、学术和科学文化上缺乏自由讨论和百家争鸣的空气以及简单化的批判，政治上高度集权，使社会主义民主徒具形式，凡此种种，其危害不仅在于使这些领域本身发展缓慢，弊端丛生，更重要的是造成党内和社会上建设社会主义的主动性创造性无从发挥，除了领导集团甚至是领袖个人以外，党和人民群众无从表现其创造

性，甚至意见和情绪都很难表达。这种状况，远远离开了社会主义的本质，造成后来改革的重大困难。别的不去细说；单拿党内生活和党内民主来说，斯大林执政以后长期残酷的党内斗争和破坏民主，完全改变了苏共创建时期和列宁在世时期的民主气氛和生动活泼的局面，没有健全的民主制度，没有有效的监督，没有根据党的事业和人民意愿的干部选拔制度；个人崇拜、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盛行，其结果是党的领导层不仅脱离人民，而且脱离了党内群众，党的干部制度不是保障优胜劣汰、人才辈出，而是大量产生缺乏远见、默守陈规的官僚和见风使舵、投机钻营的两面派。这种劣胜优汰体制种下的最严重的恶果，是在斯大林逝世后的几十年里，上面很难产生坚持马克思主义而又能适应新的历史条件改革的领导干部和坚定成熟、雄才大略的领袖，下面广大党员和群众的意见和要求很难集中起来成为推进社会主义事业的力量，也很难对干部和领袖进行监督和制约。其结果十分清楚：苏共和苏联社会的航船在近几十年的时期里航向不定，错过了许多大好时机。在世界历史的巨大变动中，上面方向不明，群众无所适从。几十年战斗的党，内部为腐败变节分子所腐蚀，外部受各种反社会主义力量的攻击，终致失败。

（十一）谈到历史地分析问题或把问题放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加以考察，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不能因为我们着重讨论斯大林的是非功过、经验教训就加以忽略，这就是苏联发展中的外部条件或国际因素，不过这里不能展开而只能简略提及了。前面谈到斯大林所处的时代是战争与革命的时期，不仅他在当时激烈斗争中产生的错误与这种时代形势有关，他领导的苏联在当时取得的巨大成功以及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吸引力更与此有关。后来苏联没有坚持改革和改革不成功，除了斯大林错误所遗留的后果以外，国际方面的因素也不能忽视。战后的长期冷战以及无休止的、日益升级的军备竞赛，除苏联领导人的失误外，以美国为首的国际资本主义的压力是重要原因，因为资本主义世界整个说来